

訪問及資料整理：蔡依琦、林天祐

# 堅持 教改理念的教育家 黃榮村部長



## 壹、生平簡介

黃榮村先生，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十日出生於彰化縣的員林鎮。於台灣大學畢業後，分別擔任了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以及Carnegie-Mellon大學與UCLA的訪問教授。回國後則任職於台灣大學的心理學系教授。之後更活躍於行政院教改諮詢委員會以及國家科學委員會。並擔任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執行長，於九二一震災的整個重建中工作身負重責，而有「征西大將軍」之稱。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一日黃榮村先生接任我國第十八任教育部長，秉持著「適才適性培育各級人才」的中心理念，並致力於持續推動各項教育的改革，針對教改不足之處，建構完善的配套措施，使教育改革的步伐和參與能真正永續推行。

## 學歷

民國五十八年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畢業

民國六十一年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碩士

民國六十五年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博士

## 經歷

民國七十一年至七十二年	哈佛大學訪問學者、Carnegie-Mellon大學與UCLA訪問教授
民國七十二年至八十九年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所）教授
民國七十三年至八十三年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合聘研究員
民國八十一年至八十三年	中國心理學會理事長
民國八十二年至八十四年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主任
民國八十三年至八十五年	行政院教改會委員
民國八十四年至八十五年	國立臺灣大學教育學程中心主任
民國八十五年至八十八年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處長
民國八十七年至八十九年	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民國八十八年至八十九年	災後重建民間諮詢團執行長
民國八十九年至九十一年	行政院政務委員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執行長
民國九十一年至九十三年	教育部部長
民國九十三年至九十四年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兼任教授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專任教授
民國九十四年迄今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 貳、成長背景

黃榮村部長出生於彰化縣員林鎮，他於台大心理系任教之後，也擔任了行政院教改會的委員以及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執行長等重要職務。除了這些較為大家熟悉的事蹟之外，黃部長他本身的童年趣聞以及求學過程是我們較少聞，也相當感興趣的地方，因此藉由這次的訪問，我們對黃部長個人又多了一層深入的瞭解，談及黃部長的童年趣聞時，他緩緩道來：

### 一、有趣的童年記事

我在彰化員林住了整整十八年，當時小學就離家中幾步路，走著田埂上小學，

傍晚在台鳳工廠旁邊的水池上順著水田往上看夕陽，樂此不疲。接著考上初中升上高中，算是循規蹈矩也會幫忙做家事的學生，不像現在的小孩多才多藝生活多采多姿。只記得小學時算珠算，老師唸完一堆數字，當大家都停止時，我還在算，達一分鐘之久，老師最後以我的答案為準，顯然我的短期記憶還不錯，偶而也被稱許畫圖畫得不錯，作文很好。

部長接著提到在員林的鄉下時，平時放學後最常做的活動，他笑著說：

我小學與初中的生活很悠閒，平時喜歡颱風天，因為颱風過後可以去撿竹筍與田間的田螺；年節時還可以在收割後的稻田摘黃色油麻菜仔，作為年節紅龜粿的調味色素。平時傍晚則不必靠釣餌就可以釣出青蛙，順路摘摘水上空心菜，沒事到放水後的水池抓抓魚，晚上則拿著手電筒或電土燈抓青蛙，在水岸邊放棍等著隔天收棍看有沒有魚兒上鉤。

至此，部長話鋒一轉，也提到了他對這片土地的情感，他說：

像是我對這片土地的鄉土之情，就是從小的時候常常與這片土地接觸才這樣培養出來的，而不是靠正規的教育！也因為這段日子的因緣，當日後我去中部災區負責921震災重建時，一下子就成為其中一份子，因為再怎麼看，都是我小時候習慣的人與事，景物既不殊，做起事來也不像是替別人做，因為自己就是其中一份子。

我們聽到黃部長提及這段因緣際會，瞭解了他對故鄉濃厚的情感，對於他日後會毅然決然投入中部九二一的震災活動，也就不覺得奇怪了。

## 二、多采多姿的求學歷程

黃部長本身的求學歷程也是令人嘖嘖稱奇，只因為除了中學時代其優異的成績外，他還與同學合辦了許多文藝活動，如果用「能文能武」來形容部長本人真的一點也不為過。

小學時我是全校第一名畢業，初中時則是第二名畢業（記得當時有一位不得了的女生，是永遠的第一名，後來去念師範學校，我則直升高中部）。上

了高中之後我迷上寫詩，還與兩位同學合辦「晨曦」雜誌，選文組（乙組）唸，經常到學校旁邊的竹林巷子背唐詩三百首，看美國詩選（今日世界社），及努力創作新詩不輟（可惜皆以散佚）。考大學時只填13個志願，那時歷史考不及格，居然上了台大歷史系。在此過程中，在高中引進文星雜誌與文星從叢刊，被拱出來競選模範生（共20餘人參選），居然高中第一名。

黃部長提到他本身是一個鄉下來的小孩，當他大學聯考完後要選擇讀大學時，沒有人可以給他做任何建議，所以當他回憶及當初的選擇時，除了慶幸自己能進入台大這個第一學府之外，也深深體會到都市小孩與鄉下小孩的差別。他說：

高中的求學歷程縱使這麼好玩，畢竟還是鄉下地方，當我唸完高中也考完聯考後，真的沒有一個人來告訴我今後人生應作何規劃，或者指點迷津，在連大學是什麼都不知道，也從沒去過台北的情況下，糊裡糊塗的就進了台北的大學。想想，當時可能隨便編一個理由，都可以不上大學或上不了大學，對比今日真有天壤之別。也因為這段經歷，我對城鄉差距的嚴重性以及後天培育的重要性，愈來愈覺得要多付出心力來重視，這種深刻的慢慢發展出來的體驗，除了讓我養成獨立自主不求人的生活外，更覺得應對下一代付出更多關注，以免流失上進的機會。一般在都市長大的人，是很難對城鄉差距所造成的機會不均等，有這麼直接感覺的。

縱使有這層感慨，但是當他談到台大豐富的校園生活，臉上也散發出愉悅的光芒，他說：

進入台大眼界大開，接觸到什麼是存在主義、地下文學、行為主義與科學哲學。在大一時開始寫「走在荒原上」系列小品，四處遊玩、聽演講，逐漸接觸很多藝文活動。但是大學生活還有更有趣的，我去旁聽英詩的課，對抑揚五步格（iambic pentameter）特別有心得，後來在Elton John的歌中也發現這種英詩結構，真有莫名的歡喜！那時看存在主義、西方小說、科學哲學書籍是一知半解，看展覽聽演講則也是不亦樂乎。同時還與同屆醫科同學定期聯誼，交換精神醫科與佛洛伊德學說的知識。

黃部長原本考上台大是唸歷史系的，與一般大家熟知的心理系有極大的差異，而在知道他中間這一段求學轉系的歷程後，讓人不禁深深佩服部長不畏困難，勇於追求

自己興趣的精神，但我們想也因為如此，黃部長才能有今日的成就吧！談及轉系的過程，黃部長慢慢道來：

當時歷史系唸到一半想轉系，於是就考慮可以文理兼顧的心理系，並且整個暑假在椰林大道、活動中心、與宿舍內猛K集合論、微積分，而且上物理課（化學與生物是後來上的），才得以轉入心理系。

而他也提及在這段轉系過程中，所遇到的一個原本對轉心理系也有興趣，最後選擇走向不同領域，並有自己一片天空的朋友，黃部長回憶道：

記得當時有一位哲學系的同學也想轉，但弄不懂什麼叫「無窮大」，我開玩笑說， $0+\infty=\infty$ ， $1+\infty=\infty$ ， $2+\infty=\infty$ ，……， $\infty+\infty=\infty$ ，所以 $0=1=2=\dots=\infty$ ，因此所有的正數系列都可以收斂到一個固定點（譬如說「零」，那就是不存在啦！），所以何必煩惱無窮大，它可以是不存在嘛！這一講弄出毛病來了，他一聽這還得了，索性就不唸了。其實他是聰明得不得了的人，他哪裡會因為這樣就不唸，他其實是放不下他的哲學，找個藉口又回去了，日後成為一位蠻有聲望的美學哲學家，在國外大學當教授。我常想，一個人不要太執著於一定要幹什麼，真正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來做，當一扇門固執的關緊著不讓你打開，so what，旁邊還有一扇更大的門等著你來開，這扇門一旦被你敲開，你就等著開大門走大路吧！

而黃部長除了心理系的專業知識外，同時也涉及了其他領域的知識，他也分享了他這段學習的歷程。

當時的台大心理系只有六個學院，心理系的必修學分不多，所以有很大的空間到各學院選課，單是數學就修了20多個學分，還修了外院的應用數學課程，像數值運算、編碼與消息理論、抽樣理論、高等統計學、計量經濟這些課，那時修課沒什麼目的，指覺得既然到了大學，就是什麼都可以唸唸吧！日後想想，這些課程也非全無益處，至少日後的研究工作需要時還可以用用（如當社會上大吵「建構式數學」要教育部來解套時，居然自己也可以有一些派得上用場的想法）。

黃部長回想起自己的大學生涯，也有許多的感想，他這麼說來：

現在想想，當然覺得大學時的樂趣多，但其實也有冒冷汗的時候，因為那時居然沒有半點生涯規劃的概念，萬一那時走岔了會變怎樣？就這樣走走停停，繼續留在台灣唸研究所（當時本來也準備要出國唸書



▲ 黃部長與本書編輯群合影

的），後來都三十幾歲了才到哈佛大學、Carnegie-Mellon與UCLA等校去，逐漸接觸到所謂有系統的大著作與大師，才定調做人類知覺的研究，也指導出20幾位獲博士學位的研究生（有一半是在國外拿的）。

部長話鋒一轉，說到自己到現階段對許多事物還能保有濃厚興趣，也跟大學時持有的「文藝復興人」情懷有關，他說：

我後來自己猜想，大學當時也許並非全無中心偏好，說不定自己心中憧憬一種「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的情懷，早有雛型，因此提早為自己做通識教育，現在年紀大了，還對基因與人性、滅絕與演化、視覺與藝術、認知與文學這些題目保有濃厚興趣，恐怕是其來有自吧！

### 三、從教職至從政的心路轉折

黃部長畢業之後，先是分別了擔任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以及Carnegie-Mellon大學與UCLA的訪問教授，回國後則在母校從事心理系的教職，之後更投入了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接著即擔任我國的教育部長。這其實代表了一個很大的轉折點，也就是黃部長從一個學術界的領域跨足至政治領域。而在這一段歷程中，部長的心路轉折是我們想要知道的。而部長也特別說明踏入社會從事的許多事情，其實都與自己大學時候的習慣有關。他說：

很多事情追究源頭，也常與大學生活的經驗有關。好比我在台大任教時，相當程度的負責了台大教授聯誼會的籌組、協助學校與學運同學溝通、負責台大四六事件的調查等等，皆有跡可循，因為這些事情與我在大學時參與屋角閒話、在大學新聞與大學論壇發表文章、目睹台大哲學系事件、關心黨外活動都有關。後來做事好與人為善，聯手合作為公益事務盡點心力，可能也受自己在大學時住遍各學院宿舍、經常與各系所的朋友交換看法所影響。就這樣逐漸塑造出日後的品味與行事風格，而這種品味可能也延續到做人之上。

黃部長也說像是自己的行事風格也會間接影響到他從事工作的態度，如九二一震災和擔任教育部長的職位時，都與過去在大學所培養起來的風格有密切的相關，他提到：

回想自己算是一位不太重名利也不愛與人爭的隨興之人，但心裡的人道精神與公平正義理念一直沒受到污染。所以一碰到前所未有的九二一震災，心裡的「硬核」(hard core)不由自己興起，因而辭去教職進入政府。一去就主張「重建是人道志業，不分政黨不理派系」，辛苦工作不以為意。

後來進入教育部正值十年教改大算帳，更是累人，於公必須堅忍，博採眾議；於私必須「放開」，以免晚上睡不著，倏忽已過四年，現在才得解脫。可以這樣撐過四年，當然與任台大教職20多年之間參與很多公共事務，擔任其他學術行政工作以及公民團體事務的資歷有關，但是也與過去在大學時所培養起來對人性的看法與實踐，有絕對脫離不了的關係。

## 四、Context-bound 領導風格

黃部長過去四年的公職經驗，大概有一年八個月在做九二一重建，後面的兩年四個月則專注在教育重建工作上。黃部長認為兩種工作雖有很多相似之處，但遭遇的問題與因應方式卻各有不同，因此他在處理這兩種事情上也應用到權變理論的領導風格，他分析道：

領導的形式應該是context-bound，假如換了另外一個大不相同的環境就要有不同的因應方式。像921重建與教育重建的規模皆龐雜且受社會的矚目，

經常需要到現場作第一線溝通與瞭解，進行協商以取得共識。但由於921重建是人道志業、重建人員是雜牌軍，與公務人員在固定機構循規矩辦事的環境都不一樣，為了要解放每位同仁的固有想法，且極大化他們的關懷與能力，絕對需要人性化的領導。但是當場合換到教育部，面對十年教改的風風雨雨及政黨輪替之後的局面，全方位的戰備領導則是當機立斷的選擇。除了該上第一線時，絕不逃避外；也儘可能在部務或部內會議中先讓同仁知道政策走向，以免在媒體上看到時徒增怨尤。在教改與回應教育的問題之外，同時也提出國家的教育願景做好規劃，教育畢竟還是教育，應該要有亂世中的堅持！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黃部長他對於教育理念的堅持與期待，從中我們也可以一窺部長處理事情的態度－亂世中仍要有亂世中的堅持！

## 五、座右銘：以快樂積極的心情培育知性與德性的下一代

黃部長從事教育工作已經二、三十年，在這段過程當中，他深深體驗到教育所牽涉的範圍非常廣，且是國家要發展的一個最基礎的工作。因此當我們問及黃部長他人生的座右銘時，黃部長也侃侃而談，以此作為勉勵自己與大家努力的方向，他說：

人才培育是一件全力以赴而且要均衡發展的國家大事，我們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應自我期勉，在此過程中，經常充滿愛心、耐心與鬥智，以快樂積極的心情扣齊兩端，為下一代知性與德性的培育，做最好的奠基工作。

## 六、勉勵青年學子的話：創意、品格、成長

在這一期的訪問中，我們特別針對部長對於青年學子有何勉勵的話，做了一番整理，而黃部長也針對現在要入大學學門的青年學子談及他的想法，他說：

時代真的已經大不同了。我們下一代的朋友多才多藝，多元發展，從小就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但現在社會與家庭的壓力大，父母要求的是學力一直提升。但當一個年輕人不能自己發展出生活目標時，人生是不會自在的。現在大學淨在學率已超過35%，年輕人開始離開家庭正是建立自己興趣與志業的關鍵時刻，實應好好把握每個啟蒙的機會。特別是台灣在WEF國際競爭力評比中，最大的正面評價就是「創意」。因此你們在國際、兩岸競爭如此激烈之時，更必須警



覺到「創意」的發揮才是你們的利基所在。因為機會永遠留給有準備的人！

另外，在大學四年也是一個學習做人得好機會。各級學校在台灣社會的升學與考試文化下，品格教育愈來愈鬆散，網路沉迷更不必談，因此年輕人能好好結交朋友，建立人際互動與團隊精神的機會其實不多，遑論做人的道理。人的一生容不下幾次走錯路、做錯人。但要不走錯路做錯人，還是需要建立一些簡單穩定的原則，而這些是要在實踐中才能獲得的。

「同學們不要妄自菲薄，把自己當成是一粒小石頭，重要的是，你應自許是推動學校往前滾動的主力之一，儘早開始發揮長才吧！」

## 參、施政理念：適才適性培育各級人才

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一日黃榮村先生接任我國第十八任教育部長，黃部長在接任致詞中以「適才適性培育各級人才」為中心理念，同時也指出其工作信念：持續推動優質政策，克服執行的困擾、加強互動、溝通，消弭對教育不利的阻力、寬籌教育資源，奠定教育基礎環境、追求卓越與履行社會公平正義、緊密有效的團隊——不能缺席，也不容退卻。當我們問及當初為何會提出這種理念時，黃部長說：

當初之所以會提出這個概念並沒有什麼特殊原因，因為「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原本就是一個很普遍的觀念，台灣目前雖然明白這個道理，但大多數都傾向於因材施教的理念。

部長認為這種現象，可由過去推動數十年的國中常態編班，一直無法在教育資源較不充裕的中南部落實看出，他說：

雖然教育行政單位與學校都瞭解「有教無類」的道理，但家長與地方說得上話的人，為了不希望輸在起跑點上，心中普遍有「因材施教」的觀點，因此用各種方法要求能力分班。但是以年級為分母的能力分班，卻可能使

學校將重點只放在前三分之一或更少的學生，其他就變成後段班，在升學主義盛行而學校也不能提供優良師資教導較差班級情況下，後段班的學生形同被放棄。我想大部分的家長不會樂見這種情況發生，但他們大多沒有發言權。

講到這兒，黃部長認為同時考量「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的編班方式才是真正符合適才適性的。他說：

最恰當的常態編班方式應配合學科作分組能力教學，即考量小六與國一之銜接，在全面推動常態編班之時，可在國一以二至三班為分組基礎，作選擇性的學科能力分組，其中英語與數學是最容易出現雙峰分配的學科，宜先處理，若有必要則再加入自然。

除此之外，黃部長在書中也提及充分運用大專學生與退休教師作為教學志工，進一步做好補救教學的工作，也是目前常態編班與能力分班之爭議下，仍須努力進行的工作。如此才能在因應社會主流價值的同時，也達到「因材施教」並兼顧「有教無類」的理想，最終每個人都一一適才適所。

## 肆、任內重要教育政策

在這一部分當中，我們延續黃部長的教育中心理念，特別與部長進行關於任內教育政策的訪談。以下則針對任內執行的「九年一貫暫行綱要、十二年國教、高等教育、語言教育、新台灣之子教育、品德教育」六大施政分別說明如下：

### 一、十年教改下的課程改革：九年一貫暫行綱要的迫切性

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因動員社會共同推動再加上全面實施性，其規模之大乃有目共睹。但是在民國九十一年學年度（逢黃部長任內）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卻爆發了嚴重爭議，當時讀完六年建構式數學的小六學生升上國一，國一又逢九年一貫課程的首度實施（民九十年為小一、九十一年學年度為小一、小二、小四與國一），在課程綱要彈性較大情況下，教科書又開放民編，導致教科書版本眾多、家長不放心；加上國一生面對三年後的國中基測，一本教科書不為足，因而補習業者蠢蠢欲動，等所有

不利因素全部浮出檯面的情況下，引發了規模大且持續一年的爭議。

黃部長認為國中小課程改革的爭議有幾個首要理由需先診斷：

首先是來自老師與家長的不適應。因為學科改為領域雖然為國際上的教學趨勢，但台灣幾十年來不曾做過，打破了很多傳統上的規矩。再來是來自專家的顧慮，擔心學歷因此下降。而來自教科書民編後的多版本併行。因為初編的課程綱要彈性較大，不同版本比對不易。

上述問題的解決，除了時間的適應與做好教師進修與家長公開說明外，學歷下降的顧慮需從兩方面考量，一為再次修訂課程綱要；另一為國中基測不需變動太多。

在國中基測問題的解決上，黃部長認為：

我們在英美歐國家小孩還不必為入學考試煩心時，已先一步作有系統的複習，所以在一九九九年TIMSS-R測試的國際排名上，我們國二下學生才能有數學第三、科學第一如此優良的成績表現，因此針對國中基測由五科改為國英數三科主張，黃部長認為是不合實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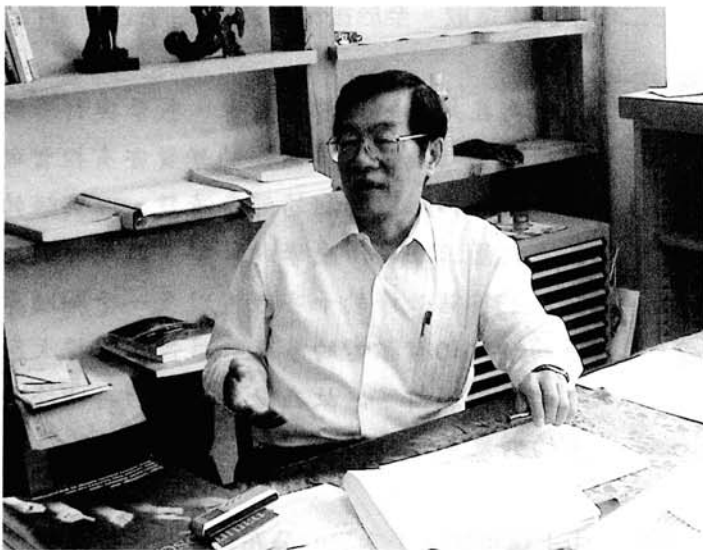
而在課程綱要的再次修訂上，黃部長認為茲事體大，乃下了一番苦心。他說：

按過去的慣例，部長是真的不需要介入這些技術性事務的。我所接的事情往往已經是演變到甚為龐雜又有爭議，因此常不得不「首開風氣之先」，跳上第一線在火線上作戰。我親自進去教育部的課程委員會，要求修改綱要內容，訂定以年級區隔為主的分年綱要（而非只是較模糊的階段式兩三年混在一起），並經由調查確定基測以考五科為宜等等。

因此黃部長舉數學與自然領域綱要的修訂細節侃侃而談，他說：

像是在數學分年綱要的修訂，在小二時就可以開始認識九九乘法表並認識乘法交換律，以避免過去建構式數學在少數僵硬教學下產生的流弊。而五年級即可瞭解異分母通分、四則運算；六年級可作簡單的質因素分解，以及找兩數的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另外，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分年綱要修訂，可將物理中的光與波、力與電磁分別放在國二下與國三上，以免份量太重。另外各分科（生物、地科、化學、物理）的綜合教材，在師資未完全培育好之前，應放到國三後半，以收統合之效。



此外，針對之前教育部公布英語一千字彙表後，造成各界熱烈討論。黃部長也特別對千字表的公布背景做了說明，他說：

這一千個字彙之編撰可追溯至民國八十七年到八十九年間，研擬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時。在多次的座談會、研討會、公聽會中，與英語教學專家、中小學英文教師，及英語教材出版界等人士一同研商九年一貫英語教學之學習目標，以及要學會多少字彙量，最後多數人贊成課程綱要所訂的字彙量不宜太多，訂低標即可。

黃部長也提及訂低標對一些弱勢族群的幫助，他敘述道：

當時就訂國小五六年級應至少學會兩百個口語應用字詞，且會拼寫其中八十個字詞。國中畢業時，應至少學會一千字詞，且會應用於聽、說、讀、寫溝通中。訂低標的主因是城鄉差異大，且個人開始學英語及補習英語的情形不同。作為一個國家的課程標準，應該以一般學生（即沒有提早學英語或課外補習的學生）為標準，才不致於導致弱勢族群的學生（或中下階層無法課外補習的學生）因為標準太高，還未進入國中就放棄學習英語，這對他們是很不公平的待遇。

八十九年的暫行課程綱要裡面已經提供了一分常用一千及二千字參考字彙表作為教材編撰的參考。建議國小教材儘量由常用一千字詞中選取；國中階段則儘量由常用

二千字詞中選取。至於後來在黃部長的任內爲什麼又公布了千字表，他則說：

我認為在知識的進階學習中，數學與科學的知識結構是比較井然有序的，當然語文（國文與英語）的學習亦有相當的結構性在，但是相對於數學與科學而言卻難以切割的那麼清楚，以英語的綱要修訂來說，就難以訂出從小五到國三每年所應學的單字，因此乃改用總量的方式修訂之，這也是現在國小英語必修的千字表，以及一千輔助單字訂定之由來。我認為語文學習的修訂仍有相當的多元發展性，若採太嚴格的分年綱要訂定，則不符語文學習的邏輯了。故在分年綱要的再次修訂中，我是仍以數學與科學為主要的對象。

由上述可知，千字表的公布可以減輕學生學習負擔，解決因坊間教科書太多，學生擔心不知如何準備學力測驗的問題，因此千字表既給了規範，又給教材編撰者彈性的空間，照顧學生之間程度的差異，不失爲一個好方針！

而教材開放後，一綱多本使中小學教科書如雨後春筍，造成學生購買教科書的經濟壓力，不少立委要求教育部恢復國立編譯館統編本的時代，一本教科書走天下，可以解決目前一綱多本造成的問題。黃部長認爲這是在走回頭路！因此針對部編本和民編本併行的制度，黃部長做出了申明，他說：

雖然我在兩年前即調整教科書為部編與民編併行（以小一到國三的數學及國中的自然與生活科技科學為部編本），且預計於民國九十四年出版，並將版權予以公共化，但這只是一個當作過渡階段的配套措施，一待社會疑慮漸漸消除後，則仍須得回歸民編，如此才能符合本國政策與國際走向多元開放審定制的潮流。

有關家長最關心的入學考試，不同版本的教科書是不是都要看才考得好的問題，黃部長認爲：

民國九十四年的九年一貫新課程就要開始第一次的入學基本考試，考的方式與高中考大學是一樣的（因為高中課本也是多版本的民編），亦即每科（包括國文、英語、數學、自然與社會五科）不同版本交集的內容才會考，也就是按課程綱要來出題，所以只要讀好一本就可通曉一綱。有些焦慮的家長會問，萬一出到與我家小孩念的版本完全不一樣內容的題目時會怎麼

辦？假如真的是如此仿高中考大學之例，只好送分啦！

黃部長接著說：

這些父母為了自己小孩能上所謂的好學校，就不管自己小孩壓力變大，我們又不能斥責他們沒愛心，只能婉言相勸，告訴他們依據很多人的讀書經驗，一本書若跳著唸只讀共通會考的內容，那一定會唸得「似通不通」的。因為每本教科書的編寫有其前後的一貫性，對初學者而言當然是應整本循序修習，豈能跳來跳去，只找可能會考的部分唸？那保證是唸不通的，反而會考不好。為了溝通這種「讀好一本，即可通曉一綱」的觀念，大家真的要有溝通的理性，以及有耐心與同理心。

## 二、K-12 國民教育：五年等化&非考試分發之入學方式

在探討十年教改的緣起與架構時，除了教改還有許多待改進的空間外，黃部長在書中對於K-12國民教育的實施有其精闢見解。他認為當前國中推動新課程與過去所衍生的的一些問題，包括國中基本學歷測驗、一綱多本、多元教學、高中職多元入學等，宜採十二年國教一併解決。台灣辦教育已到需要時時與國際作比較的時候，現在國際上已傾向於不在國三與高一之間設統一考試的關卡，且高級中等學校傾向高中化，故具有國際性的K-12教育目標是值得推動的。黃部長並且提到：

台灣在民國八十六年起即規劃幼托整合，並在民國九十年開始推動高中職社區化方案，前者爭議甚多迄未實施，後者則仍在奠基階段未竟全功。但是兩者比較之下，向下延伸的公立精神對家長的幫助，比向上延伸只針對學習者的邊際效應要來得大。但考量台灣現狀之所以不能操之過急，主要是因為K-12國民教育的推動需分階段處理。從原有的九年要擴張到K與10-12皆非從零開始，在K的部分已有系統龐大的公私立幼稚園與托兒所存在，10-12年級則有公私立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在，這些既存的學習機構與學校皆已發展出它們的特色，各有其優缺點，但考量國民教育在師資、設備、與教學內容上應有一致性之要求與標準，所以必須先做好「等化」的工作。也就是設一過渡的五年時間投入教育資源，拉齊公私立與高中職五專前三年的差距。如此在每間學校素質皆提升的情況下，也就沒有誰家小孩進去「比較差」學校的問題。

除了五年等化工作之外，黃部長也認為推動K-12國民教育也需考量名校與入學方

式的問題。他說：

像是國人迷信要能力分班、就讀名校、依考試成績高低分發才能確保學力的想法根深蒂固，所以要先讓社會先瞭解K-12國民教育的結構性改革，不只能呼應世界潮流、促成多元教學、減輕升學壓力，還要證明這是提升全民素質，不會降低學力的一帖良藥。因此在小六、國三、高二這幾個重要階段，應實施非考試性、非分發用途的學力檢測來確保教育的品質。

隨著出生人數的下降，國中畢業生人數遞減，近十年來由三十八萬的高峰降至目前的三十萬人，因此國中畢業生的升學機會逐漸增加，民國七十五年即達到百分之百，就供需情況來看，已經具備十二年國教的條件。但不少人擔心實施十二年國教，爲了爭讀區域內的明星學校，將造成大量形式上戶籍遷移的情形。因此，部長也對高中職社區化中造成明星學校的問題，做了一番陳述：

高中職社區化除了經費問題外，包括學校本位主義心態、學區規劃、高中職缺乏特色、公私及城鄉資源落差等問題。當高中職免試升學後，無法招來明星學生，明星學校的光環將失色，基於學校本位主義心態，不少的明星高中反對。傳統所定義的明星高中，其實就是指升學率好的學校，但多元社會應存在多元明星，只要辦出學校特色者即屬明星學校，各校不能因爲一元的明星心理作祟，而忽略學生多元智慧的培育，更何況明星得自己辦出來，並非由一流學生所成就的，謹守過往的光榮不思進取將缺乏競爭力。

不可諱言，基於明星迷思的心理，求好心切的家長們可能還是會設法遷到有明星學校的學區。也許初期將產生「幽靈學生」的現象，但為了學生可以就近入學，統整資源提升教學品質，並提供學生適性多元的發展，學校社區化是不得不然的作法。

黃部長同時也認爲，過去因爲各階段教育都在爲下一階段的升學做準備，所以國內的中等教育也就陷入升學主義的泥淖不能自拔，因此無法建立自我的特色。他說：

實施十二年國教的用意雖在淡化明星的色彩，但並非完全的去明星化。因

此我們不但允許明星學校的存在，更期待多元明星的建立。但是基於高中職社區化原先用意就是使資源不足、偏遠地區的學校藉由高中職社區化鼓勵學生就近入學，並充分整合社區教育資源提升其教育品質，因此明星學校或資源較好的學校應該以自身經驗幫助其他學校，以縮小公私立與高中職之落差，如此才能真正解決明星學校的問題。

### 三、高等教育卓越：危機感&獨立評鑑機構之成立

現今國際間莫不以提升高等教育的競爭力作為國家重要目標之一，有些國家如英美澳甚至將其當為大量吸引國外留學生的教育產業來經營。但台灣要如此做，必有待先提振國內的大學素質並擴大投資才有可能在國際間占一席之地。那是因為從民國八十一年到九十一年間，國內大學院校從51所增至139所，四年制大學院校淨在學率從13%提昇到37%。但大部分是大量專科改為學院，而專科的規模、師資、與運作方式在未嚴予規範下，難與大學校院的水準相匹敵。因此，若事前未做好準備工作，升格後再來要求，當然事倍功半。雖然政府近年來致力於「台、清、交、中央、成功、中山、陽明七所研究型大學的整合」，並於去年提出「打造國際一流大學5年500億的計畫」，但也基於我國大學還陷在質量失衡與經費不足的泥沼當中，所以也引發了許多爭議。黃部長認為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即是「危機感」。他說：

以英國為例，去年他們發現牛津大學的每生培育成本與哈佛大學相差四點五倍，與耶魯大學比則相差三點二倍，一般大學的師生比從十年前的9：1降到現在的18：1，教員薪水也偏低。以英國過去優良的大學傳統當然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因此乃陸續制訂白皮書以期促進，過去有Dering Report，現在則有高等教育白皮書在英國造成很大的風潮，但英國政府還在頭痛大筆經費的籌措。

透過比較與回顧傳統，英國及歐洲現在都有很濃厚的危機感，也都正在研擬可行的方案放手一搏。相對而言，台灣與南韓是屬於雖然沒有光輝傳統，但是已經開始有危機感的例子，黃部長則是以台大為例子說：

台大在國內教育研究條件變好後，水漲船高，迅速國際化，已開始具有國際一流大學的雛型。這可能是因為在這十幾年因教育環境多元開放，其他研究型大學日益精進，對台大形成極大的壓力所致。



以高等教育經費所佔的GDP比例而言，台灣約占GDP的1.9%，該比例低於美國高於英國，但黃部長認為台灣之所以每生培育成本在國際偏低，歸納起來主要有幾個因素：

- (一) 國民年平均所得較低之基準線問題。
- (二) 大學間數過多造成稀釋現象。如英國學生約台灣兩倍兩倍以上，有一百七十四所大學；我們兩千三百萬的人口有一百四十所大學院校。
- (三) 學雜費收入缺乏彈性調整空間。
- (四) 英美國家對大學的支助來自多重管道，除了教育部門的挹注外，其他公私部門的科研經費多重且充裕，相較而言台灣在這方面受到相當的侷限。
- (五) 公私立大學每生培育經費相差過大。

為此，黃部長語重心長地說：

任何一間學校有危機意識並且只要願意改革，展現出企圖心的話，則不怕任何的評鑑。像是英國對於學校的經費補助即有差別標準，也就是75%研究經費只撥給前25%的大學。因此台灣未來也需走向評鑑的趨勢。為此，規劃一個獨立的大學評鑑機構是必要的。

而提到「師範院校的轉型」，黃部長話鋒一轉，認為各大師範院校應該也要有「危機感」，他說：

由於近年來國內出生率大幅下降，不僅國中小學校逐年減班，同時教師缺額也越來越少。為解決師資培育「供過於求」的狀況，「師範院校的轉型」也因運而生，但是隨著學校增多，高等經費有限，各校轉型計畫都應納入與鄰近大學院校進行整併的策略與方向、期程與績效指標等，因此師範院校本身也應該要有危機意識，才能在這一波改革潮流中，精益求精。

黃部長對於之前因大學評鑑所引發的爭議有其看法，他在書中提到，台灣目前已啟動技職院校的評鑑部分，一般大學則是在進行中。過去台灣雖曾做過大學評鑑，但由於未全面公布評鑑結果並將其當成經費分配的依據，而流於形式。評鑑工作需有專責單位，並加強研究各國評鑑體系，才能在校務評鑑（含學術領導）、學門評鑑、與教學評鑑上設定具公信力的指標。惟由世界各國經驗可知，在人文

學科與教學評鑑上相當困難，若實施不當反而會對其長遠品質之提昇有負面的影響，務必謹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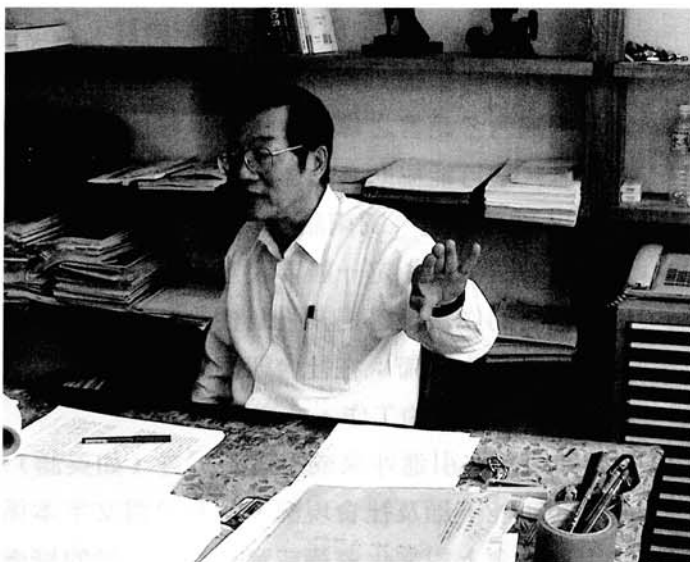
台灣的大學在人文藝術領域與具本土特色的研究上，亦有相當成就。但很多是以專書的形式或中文撰述，因此不宜在未深入了解前，就以國際性的指標（如AHCI）來評估，以免失之公允。因此對於設置一個獨立評鑑機構的必要性，黃部長提出其看法，他說：

大學評鑑的目的並非在於提供學生入學選校選科系之用，那只是附帶目的，真正的功能在於經此程序來促進大學分類，建立各大學的特色，並依評鑑結果當為經費分配的重要依據之一，讓經費分配不再只依人頭或建築物作依據，而能達到依表現來做具有區分性的分配（differential funding），如此則可望將國內部分優秀的大學推向國際一流的境界。

而面對大學生的程度是否普遍降低的疑問，黃部長說：

這一問題也曾經在英國發生過，英國也有大學生人數倍增的現象，從統計的觀點來看，十年前假設一年祇有一百人能唸大學，十年後可能有兩百五十人，其中的一百五十人在十年前是過不了大學設定的入學關卡的，所以會把平均水準往下拉，但是兩百五十人中的前一百人應該不遜於十年前的一百人，而且還讓過去沒機會唸大學的一百五十人帶上來。

因此，儘管國立大學紛紛爭取轉型研究型大學，但公立大學的大學部招生容量還是應該設法增加或至少維持，大學必須接受獨立評鑑以兼顧「學術研究」與「基礎教學」的社會責任，如此，才能確保大學生品質。



## 四、語言教育：本土教育&小三英語實施之正當性

台灣在解嚴之後，對於本土認同與台灣主體性之強調蔚為風潮，也逐漸發展為社會的主流價值，惟每逢選舉其間常易淪為意識型態的口角。在國際上已成為常態之本土教育如何在國內免除掉意識型態之爭，黃部長在書中對此曾提出其想法，他認為在談及國內的語言教育時，經常要去釐清什麼是母語、鄉土語言、國家語言、官方語言，以及相關的教育政策，是一件相當複雜且敏感的工作。他說：

有些人常說在小學教母語或鄉土語言，其實沒有必要，因為母語就是媽媽的語言，在家裡學就可以了。講這種話的人大概是不太清楚目前的狀況，若真如此，何以客語與原住民語言流失得這麼快速？閩南語也好不到哪裡去。以前我也想教小孩講閩南語，但他都興趣缺缺，做其他事去，因為學校也不講，街上也沒這種語言環境。那是後來小五放學回家，剛好電視有楊麗花的歌仔戲，他看了半年之後就會聽會講了，也因為如此，在我母親辭世之前，他們經常還可以用閩南語交談，是我母親生前最大的慰藉。現在小學推動鄉土語言教學，使得客語、原住民語、與閩南語的流失得以遏止，實在是不得了的成就，應予肯定。

至於要把國內各種語言訂為國家語言，甚至當為官方語言，並立法予以規範，則是另外一件事情。黃部長以制訂「語言平等法」為例，他認為本法之訂定旨在宣示對國內各語言之尊重，賦以平等地位，並課以保存之國家責任，故應有反歧視條款，儘可能協助各語言有較好之文字化，承認並尊重多元文化的發展。但將原住民語、客語、閩南語、與國語皆視為國家語言，並不代表它們都是官方語言。官方語言的指定一般要入憲，現在全球有一百一十二個國家就是這樣做的。比較適合的作法是透過非強制性的教育措施，如在國中小學習母語或鄉土語言，來擴大語言的流佈；在社會則應對各種語言持尊重之心，平等對待，必要時國家應有責任做保存的工作。

同理，在引進外來或人造的語言（如英語）及音標（如KK音標、羅馬音標）時，也不能不顧及社會現況，以及語言文字本係自然演進自然流佈的特性，否則將引起社會上對文化霸權或意識型態掛帥的疑慮，如將美語強力引進並強力推動成為另一種官方語言，或鄉土語言的早期學習強迫用羅馬拼音標記等。黃部長特別強調：

假如一個國家的國力真的可以因為大力推動英語而提升，假如一個國家的認同真的可以因為大力推動鄉土語言而達成，則社會各界當可支持。但事情有這麼簡單嗎？這未免把語言的位階擺太高了。我想，國力的提升與國家認同這兩件事太重要了，重要到沒有辦法只靠做一件事來完成。我們應該要努力去做，但不要動不動就扣上大帽子，如此反而會變得寸步難行。

而針對英語課程向下延伸至國小三年級的問題，黃部長在訪談中則娓娓道來，他說：

現行之英語教學政策是從小五、小六辦理，但事實上，在二十五縣市中，真正從小五實施的只有九個縣市，其他各縣市都自動向下延伸到小三、小四，甚至是小一、小二與幼稚園。真正遵守現行規範者並不多，這些都與選舉考量及家長求好心切的態度有關。因此在衡量歐洲國家、日本、韓國都是小三才教英語的情況下，且若是師資足夠、環境設備充足，台灣是可以跟進，但為了避免造成學生語言混淆、引發語言優越的惡性比較，甚至造成文化認同影響問題，台灣還是不應該超越他們，以免與小學生認知發展不符，造成小學生學習國語及鄉土語言的困擾。

此外，面對大多數縣市均向下延伸，甚至有台北市等八個縣市今年起已延伸到小一施教。黃部長認為：

如果有些縣市的英語教學要再向下延伸，必須就其師資、教材的評估以實驗計畫的方式進行，經過地方縣市議會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備後，才能施行，以臺北市為例，最後也是得通過市政會議通過才得以執行。

## 五、新台灣之子教育：外籍配偶識字方案&補救教學

我國的人口結構在這幾年有很大的變化，十年來人口的出生率從每年三十二萬人逐年下滑到去年的二十二萬七千人，檢降幅度達，三分之一。而依據資料，現在小一生中，外籍與大陸配偶的子女約占總數的1/20，但是在六年後將占1/8，其中尤以外籍配偶的語言與社經條件最需協助。黃部長說：

外籍配偶的語言進修與社會融入上，其實都有待我們的社教機構大力介入，就

教育文化方面提供外籍配偶具體之照顧輔導措施。而建立外籍配偶終身學習體系，促進外籍配偶在臺婚姻與文化的正向適應，提昇外籍配偶個人價值，開發人力資源，俾利於個人、家庭與社會發展，也方可以有較理想的親職教育。

黃部長也提到要真正提昇外籍配偶子女的受教品質，當前最重要的是「補救教學」，他說：

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的子女所唸的學校，大部分集中在較偏遠的縣市與鄉鎮，教育資源在程度上來說並不理想。因此對於這些新台灣之母與新台灣之子所面臨的不利條件，必有待在教育資源上的大力投入（如首次將其納入教育優先區指標），並做好補救教學的工作，才是目前最緊要的。

### 六、品德教育：品德與教養

過去教改以處理教育的結構性問題為主，較少傾全力來建構教育系統中應發揮的主流價值。主要原因是解嚴之後，累積了太多結構性的問題需要調整，也有很多教材與教學上的意識型態需要解構，因此去意識型態化與挖鬆管制性的結構，就成為當時社會上認為教改最需著力的要點之一。黃部長回想當時對一些普世價值與回歸教育本質的討論雖有著力。但提到為發展學校品格及道德教育內涵，期能培養學生實際生活之正確態度和情操的品德教育，他則認為品德與教養則是今後所應努力的目標，他說：

過去國民教育中相當重視所謂基本德目（如四維八德）以及童子軍或青年守則的教育，現在看來當然皆已過時，但新時代也有其基本德目，應更新過去的教育方式，而非將其放棄。以家庭類的德目來看，家庭在現代仍是社會最基礎的運作單位，兄友弟恭、孝順父母、應對進退、兩性平等、尊重長輩，仍是應有的基本概念與行為。國民教育若不能與家庭教育互相結合，日後的品德教育成效勢必事倍功半。

而在言行與教養的觀念上，黃部長認為：

一個人可以書讀得少一點，但卻不能不堂堂正正的做人，該一基本要求並不因時代變遷而有所不同。至於經典著作的閱讀與通識教育的推動，也是

高中與大學生應予培育的教養課程，尤其在現代社會中益形重要，也符應兩百年前Humboldt的主張。但教養的培育主要還是在實踐上，這一點是不可不辨的，一個人可能滿腹經綸卻無大人格局，這也不是我們要的教養。

未來教育改革，必須更加強過去十年似乎一直被忽略的「品德教育」，像是「禁止校園體罰」、尊重學生人權，就是其中一環，還有近期討論甚多的學生的「民主法治教育」與「人道關懷」，都是值得我們一起去努力的！

## 伍、回顧與期許

在我們正式進入訪問主軸時，黃部長首先就特別對十年教改的種種問題與爭議做出他個人的一些看法與省思。遂可見黃部長一路走來對十年教改的點點滴滴有著深刻的體驗，而他也從中述及其省思：

### 一、十年教改的風起雲湧

從一九九四年四月，以台大教授的身份走上街頭，高喊要「廣設高中大學」以及「教育現代化」的四一〇運動，到十年後的今天，教改總共經歷了十年的風風雨雨。這十年當中，黃部長親身參與其中，回顧一切，黃部長也有其想法：

「十年教改風波不能單純的只採一種觀點來理解。任何具有系統性的集體不滿，背後一定有深層的理由在運作，政治與選舉只不過是火上加油，再予以扭曲誘導從中取利而已。」

黃部長提到教改之所以不能單純由一個觀點理解，第一個理由是「不同教育理念拉扯，難以獲得均衡」，他說：

如台灣長期以來已經對子女教育與學校教育型塑出一套價值觀，如愛心觀、平等觀、素質與能力觀、多元與自由觀、公平與正義觀等。這些觀點並不能窮盡每人心中的看法，當社會上不同族群的人有歧異的觀點組合時，政策的拿捏就變成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而其中更包含不同理念的拉距，如量的解放vs.質的

提升（高等教育機會大增是否導致教育素質的降低）；教育鬆綁vs.秩序與穩定（自由化的市場機制取代政府對教育的管制後，形成多元競爭的局面）；一網多本vs.教科書統編（營造多元活化的學習內容受到國內考試升學制度的影響，反而增加了孩子的負擔）；多元競爭與選才vs.公平正義之維護（各級學校全面推動多元入學制度後，另一股傳統一元化標準開始質疑多元入學制度的公平）；學習壓力減輕vs.學力提升（教改強調快樂學習是否造成學力降低）。

黃部長說這些理念的集體拉扯，會產生底下的問題：

其一是當該系統被要求兼顧各項的兩端以求系統均衡時，在實務上難以做到；其二是每個人在選擇各項的兩端時，不見得都採取左邊或右邊，因此形成社會上形成極大差異的選擇光譜之問題。在政策制訂時常需要大量溝通，而且具有極大的內在不穩定性，每隔幾年理念結構在歷史與社會因素影響下又會有不同的動態調整，以致政策經常需要在這些變化下予以修訂，使得教育難以穩定的發展。

黃部長接著說第二個理由是「配套不足，有的是實施後才看出問題」，他說：

以大學多元入學為例，過去台灣數十年已經發展出聯考這項考試工具，普遍認為像多元入學中分太多方法比，如在「申請」比、「推甄」比、「考試分發」比，誰知道裡面搞什麼？所以最好是大家一起比，用總分比誰管你是誰家的小孩！又兼教科書在此關頭開放民編，一網多本未予舒緩，又雖大學容量擴增但名校偏好仍在，補習壓力一時仍難抒解，對中下家庭的負擔與不利並無充分數據可供解惑。因此，當社會懷疑比較有辦法的人會去不當佔有那30%的多元，多元入學的精神與實務馬上會受到挑戰。

因此我們需要破除聯考「表面上的公平」的社會迷思，黃部長說：

多元入學的實施有其盲點，惟揆國際的「申請制」主流，台灣在全球化的壓力下實無不參酌推動的條件，但為顧及台灣特有的公平正義觀點，也不能操之過急，乃保留至少70%為準聯考的形式以當過渡。其實這兩三年來，申請加上推甄每年只占18%，其餘80%左右仍採準聯考的考試分發。

因此黃部長認為，教育行政單位與大學站在這種歷史困窘下兩個原則是需要掌握的，第一個原則是「簡單、公平、多元」：

所謂「簡單、公平、多元」就是讓大家覺得入學方式可作簡單選擇，可降低不確定感，而且入學程序確實公平，在推薦信與面談的要求上應具公信力。有些家長相信推薦信可以讓自己的小孩得到更好的機會，其實這是不正確的。至於社會正義（如拉平城鄉差距），推甄可扮演一小部分的功能，並在教育資源另行挹注。

而第二個原則是「在實際運作上必須要比現狀好」，部長說明道：

仿「Pareto最適的概念，就是有20項需要改的，有10項改不了但維持原狀，另外10項可以改的比原先好（如申請制的統一彙辦、術科統一考試、五類入學方式縮併為兩類）。除非你覺得這個系統根本一無是處需要重新來過，否則就該系統本身而言，就可以說是已經被「改得更好，almost everywhere」。

十年教改爭論的原因澄清後，黃部長個人則認為教改架構仍有討論的空間，他告訴我們：

教改不等同於教育，教育是主體是目的，教改則是手段。理念上的改革不只有內容（如鬆綁、現代化、多元開放、公平正義），它也是一種風格的呈現。惟改革需確定方向，如回歸教育基本面；改革是為了提高教育品質，改革就像替小孩洗澡，但不能在倒洗澡水的同時把小孩也倒到泥土堆去（Don dump the baby out together with the bath water!）。

所以黃部長認為在行政上推動改革時，不能只是一種風格，不能只是大要，它必須也是一種具有細節與考量配合條件的實踐，他說：

十年教改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做制度性改革時，幅度要大、決策要明確執行要堅定；但在做課程改革時，則應細緻、應微調、求穩定。在推動改革時，技術上也要有所拿捏：總之教育要改革，但要穩當；制度要配套，不要複雜；學習要品質，不要有不良壓力；入學應多元，但要簡單與公平。



## 二、永續教改向前行

談到對於未來教育的期許，黃部長認為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競爭對台灣的各行各業已是生活的一部份，這種形勢的轉變，對國內各級教育的衝擊是立即且巨大的。但國內教育環境仍有很多舊結構與新生問題在，當我們設定本國教育應以追求卓越、公平、且具效能優質化的教育為目標時，持續進行必要的改革，是一條不能不走的路。

雖然教育的改革進行時有種種的雜音與反對聲浪，但也因為任何的教育措施都需要與時精進、花費時間並投入資源，所以我們不能失去持續教改的勇氣，失去規劃未來教育願景的信心，必須重回教育現場，找出教育的主流價值、回歸教育的基本面、做好奠基的工作；在互相拉扯的教育理念群組中，找出盡可能的均衡點，來從事入學與課程的改革，並落實多元教學；最後則設定培育人才的國家目標，繼續研擬進一步的教育促進計畫，因此為使教改能永續順利的向前行，黃部長則在書中提出了以下的見解，表示對未來教育的期許：

### 第一：「努力邁向國際化」

黃部長認為要邁向國際化可從以下四點做起：

#### （一）大學分類與國際一流大學

他認為台灣的大學在基礎設施與辦學成就上參差不齊，有鑑於大學是帶動各級教育的火車頭，也是提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一環，我們必須透過大學評鑑並釐清資源分配的方式，將大學分類，依其特色在教學、研究、與專業上各擅其長；而且能擴增資源，加強投入在若干表現良好的大學上，期以二十年時間（以仿美國Stanford與UC系列為例），逐步型塑出幾所國際一流大學，以期在國際上一爭長短，並帶動各級教育之優質發展。

#### （二）中小學科學教育的促進

以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在1810年創建柏林大學時，即特別標舉「科學」與「教養」為其核心來說，這對中小學課程現代化依然適用。因此黃部長認為我國科學教育的推展有國際水平但仍有甚多尚須精進之處，一個人會想深入研習科學是有許多理由的如：知性與好奇、浪漫與推理、工具性與情境性的動力以及科學是建立知識觀與世界觀的必要素養等。因此在科學教育的實施上應菁英與普及並重，除此之外制訂科學教育白皮書，擬訂中長期的行動方案，以期對國內學生科學教育的啟蒙發揮作用。

### （三）國際架構下的英語學習

對於英語教學的實施為解決各縣市步調不一致及舒緩家長的心態，經參酌法、德、日本、南韓、中國等地，乃採統一下降至小三。學習外國語言，尤其是國際強勢下的英語，在學習與關鍵期的考量上，當然是愈早愈好。小孩在此發展階段中，正值全方位探索外在世界的年齡，但外界是非英語環境下，為了追求「不輸在起跑點」，而要小孩去學英語，無疑讓他們在一個孤立體系中缺乏知識內容的學習，阻卻小孩去多方探索各類事物的可能性，也失去先學好母語與本國語文的先機，其實是弊多於利的。學得早不如學得好，我們不是雙語國家，英語也還不是官方語言，台灣必須參酌同類周遭國家的經驗。因此綜合考量下，待師資與教材等配套配合上時，才再予以提前學習才是最適宜的。

### （四）建立學習型社會

學習型社會在現代化的講法比較帶功利色彩的，特別標舉知識經濟與數位化的時代特色，希望能使終身學習的推動成為國家競爭力的一部份。惟這不表示傳統知識與風格需棄置一旁，他們反而是相輔相成的。為了建立學習型的社會，必有待從小即教導終身學習的理念，所以各類平台的建立，可以說是政府與民間最急需做的事，且必須要有導引手冊與主題概說，使大家不會迷失在資訊叢林之中，建立一個有效率又富含生命內容的學習型社會。

## 第二：「學校與社會的連接」

內容分述如下：

### （一）學校本身的調整

各級學校旨在提供基礎教育而非職業訓練所，惟第三級教育（尤指高等教育）愈來愈普及，就業的壓力也愈來愈大，所以學校與社會之間的銜接問題愈來愈受到重視，這裡面的問題就牽涉系所整併或轉型，尤其是公立學校系出多門或過時，不只畢業後就業困難，教研工作亦難有效進行，實應痛下決心調整，並列為大學評鑑之一部分以促其加速改進。但對指標性的系所，如人文學院中的文史科系與理學院的基礎科系，因是高等教育的基石，則不能太持功利之心。

### （二）產學合作與最後一哩（the last mile）計畫

部長也另外提到產學合作與最後一哩（the last mile）計畫，更是改進學校與社會銜接的最有效途徑，他說明以台灣產業界的豐沛資源來挹注學校中的後期教

育，但必要的制度面配合與學校的決心是其中的關鍵。以台灣而言，在當前WTO架構與兩岸競爭下，必須找出利基之所在（如台灣在WEF國際評比上，創意部分），據此在教育系統中予以發揮，方足以培育出具有競爭力的下一代。

### 第三：「弱勢者教育與公平正義之發揚」

他解釋道：

台灣辦教育五十餘年，最值得珍惜的就是對弱勢者教育的重視以及公平正義觀的共識。不管是在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社會經濟不利家庭子女等類的教育，以及新生的外籍配偶子女教育，都是必須持續監視加強的項目。以原住民為例，原住民教育所碰到力不從心的困難可能不能純從教育機會（因有各級升學的特殊優待）或資源投入（因中央教育總預算中有1~2%的專屬保障）來看，還必須考量社會層面的經濟、就業、家庭與認同問題，需要全面促進，將這些項目懸為標的並隨時與國際比較，以免愧對過去近六十年的努力。

### 第四：「主流價值之建立」

他對主流價值做了以下的描述：

在台灣全力衝刺國際化的同時，如何在觀念與實際行動上扎根於本土，是當前教育體系在課程設計上的一大考驗。國內教材的編排應釐清各種迷思與糾葛做好奠基的工作。此外，教育本身有其目標，不必跟著社會上不盡正確或混亂的聲音而起舞（如強調基礎性課程、帶好每位學生、五育並重與教學正常化、辦學與教學專業自主、教育中立等屬於教育本質的特點），應堅守崗位促成項項回歸教育本質，才能取得教育最大的功能。

### 第五：「建立國家人才培育目標」

黃部長認為國力繫諸人才，殆為定論。辦理教育旨在培育各類可用之才，從而全面提升國民素質，亦無可爭議。惟辦理教育正如同其他重大國家政務，需有上位原則可資參酌，因此人才培育需有明確之國家目標並兼顧國家發展需求，方能成事。國家人才培育目標之訂定，需考量三個作法：

#### （一）釐清國家中長程發展中的需求

有別過去強調人力規劃，大量發展技職，現在國家中長程發展的人才需求，應

以經驗為師，做比較大類別的推估，因為一方面現在產業細節調整迅速，很多線上的工作技巧是可以靠短期的職前訓練來完成的，重要的還是推估基本類科，再配合最後一哩計畫以及訓練，來做中長程發展的人才需求預估，並且在過程中讓具有全球性眼光的產業界人才參與討論，才是正辦。

## （二）建立人才培育哲學

人才的培育不能太過工具性，全人的教育才能使人才更具社會關懷更有創意，因此人才培育的哲學需強調主流價值之建立，以及回歸教育基本面（go back to basics），在此寬廣的基礎上開展人的教育，並結合專業學習，才是培養具競爭人才的不二法門。」

## （三）撰寫國家人才培育白皮書

相較於各類教育紛紛推出白皮書之下，我們對應居上位的人才培育白皮書，仍付諸闕如。雖然在挑戰2008計畫中亦有e世代人才培育方案，惟迄今仍無一本國家人才培育白皮書，反映在台灣各類政策上，經常是子法先行，母法未備。因此為統合各級教育發揮最大效能，儘速制訂一部深思熟慮的國家人才培育白皮書，才是正途。

# 陸、後記

在陽光普照，風和日麗的一個早晨，我們走進台大校園與黃部長進行了一個多鐘頭的訪談，初見部長平時研究之處，樸實大方的原木書架上堆滿了部長一本本豐富的藏書，牆上則掛著一幅Gradiva的畫，畫中是一位龐貝古城的公主，她身穿布裙，拉著裙擺顯現了其知性與教養。部長在接受訪問前，就先跟我們介紹起此幅畫與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的淵源，說這幅畫是佛洛伊德最喜愛的收藏品，不禁讓人佩服起部長高深的心理學造詣，以及他在生活周遭展現出對心理學的熱愛，這一點是讓人印象最深刻的！而部長在正式進入訪問時，也事先準備了許多資料以供我們參考，並對我們不清楚之處提出澄清及解析，從部長和善的言詞之中，我們也發現了部長對於教育的熱愛及抱負，在此，仍然要感謝黃部長能接受我們的訪問，讓我們一窺媒體下部長真實的一面！

### 參考文獻

黃榮村（民93）。**大學與啓蒙：兼談我們那一代**。雲林虎尾科技大學演講稿。

黃榮村（民93）。**人性、創意、與領導：我的公職經驗**。台北信義扶輪社專題演講稿。

黃榮村（民93）。**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修訂與爭議**。

黃榮村（民93）。**教改風雲與教育重建**。